

# 把新劳动合同法放到更大视野中去考量

□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研究员 王颖

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中,不难发现声音主要来自于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包括张五常等一些崇尚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经济学家对新法提出质疑,认为有可能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与此针锋相对的,主要是部分参与立法过程中的专家学者从劳动法体系、人力资源和劳工权利等方面所作的辩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和意见却少有耳闻,而他们恰恰是与这部法律最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体。

笔者刚刚从中国企业家论坛归来,这个主要由民营企业家自发组织的论坛每年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市郊的亚布力举行,被认为是具有了中国“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的概念和高度,已经举行了8届之久。与亚布力寒冷的天气相比,会上关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讨论倒是十分热烈,让人感触良多。略作整理,笔者将参会企业家们所持的观点分成这么三类:

第一,反对派,持此观点的人以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为代表,包括几位分处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他们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违背了市场化用工的原则,用人为行政核定的标准提高企业成本,非但没有起到促进劳工待遇的作用,反而酿成了某些企业大幅裁员的劳工风波而事与愿违;

第二,有条件质疑派,认为新劳动合同法遭受如此大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过程不透明以及新法出台征求意见环节的缺失。

第三,基本赞同派,持此观点的企业家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等为代表。这些企业家的态度也容易理解,因为其掌舵的企业已经从低价竞争的阶段成功跨越到质量品牌差异化竞争的阶段,公司的人工成本早已处于行业领先的薪酬水平,像社会保险和带薪休假等基本员工待遇更不用提,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其影响甚微,因此也对新法的推行和意义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

有意思的是,在企业家内部对新劳动合同法意见分歧之际,出席亚布力年会的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也针锋相对。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正确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和团体,但可能最后的结果相反,受这

不光是企业家,整个社会如果不把新的劳动合同法放到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考量,显然我们的结论会有失偏颇。不由让人想起当年加入WTO前大家恐惧、困惑、迷茫的情形一样,结果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不仅没有瘫痪,还因为新的生物终端的存在更加完整和健康。劳动合同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企业家需要做的是对这个时代来临的精神准备。

个法律最大伤害的恰好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的优势”,真正去研究一个政策,它的最终效果会是什么。

然而,紧接着其后,燕京华侨大校长华生在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转型中》的主题演讲中对这部10年来最为重要的劳动法律就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注解,他明确指出,尽管新《劳动合同法》里面的条款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这个方向总体上是正确的。在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各种转型中,竞争资源的转型来得最为迅速和迫切。走到今天,廉价劳动力、相对被低估的环境保护、资源价格、安全生产条件等都已经日益迅速消失,中国企业家必须适应和跟上这个变化。此外,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汇率重估等重大挑战客观上也需要劳动力等资源价格真实化,同时促进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内需提振的重要条件。

企业家论坛上的热闹讨论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但这样一部法律在企业家群体中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等提出的企业家意见传达渠道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参会人的附和,但是这也多少让人意识到一个尴尬,那就是企业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缺乏敏锐度和参与度。实际情况是,在去年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尽管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月里,就收到反馈意见19万件,创下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但大多数企业主并未特别在意,直到华为辞职门等事件被报道之后,企业与劳动者才群起醒悟。这显示出劳资关系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标杆性和重要性才刚刚开始被重新审视。但是,由此将问题归结为沟通管道不畅、博弈不充分的“一边倒”,以致对新法投以非议并非正确态度。关键是在于这一点,广大用工单位就会明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真正含义和制度初衷,并因此消除对《劳动合同法》这一核心问题的恐惧,从而以和平、理性的心态去迎接新劳动制度的到来。事实上,如果仔细比较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就会发现新《劳动合同法》跟《劳动法》相比并无大的出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雇佣劳动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要给劳动者上保险”等要求,在1994年的《劳动法》当中已经全部出现,这次的《劳动合同法》只不过向前稍稍推进了一点点,即原来只提出要求,而没有说明违反要求怎么办,这次在几个条款上稍稍加大了这方面的约束力。

第二,对中小企业需要扶持保护的误读。扶持中小企业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所有国家的国策,但是它本质上与劳工权力的保障是两回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相比于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新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

续工作满十年的;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将新法与旧法相比较,原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实践中往往只要劳动者一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会立即表示不同意续签合同,导致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法达成。在这一点上来看,相比于旧法,新的劳动合同法仅仅是降低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门槛,只要条件满足即可达成,并不是凭空提出这一概念。这里的关键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是铁饭碗,仅仅是员工和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签订劳动合同的一种合同形式,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给付工资,双方维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劳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即便员工和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仍然有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如双方协商一致、员工违法违纪、因伤病无法继续工作或者经济性裁员等情况下解雇员工,员工不可能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借口成为单位的“老赖”。认识到这一点,广大用工单位就会明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真正含义和制度初衷,并因此消除对《劳动合同法》这一核心问题的恐惧,从而以和平、理性的心态去迎接新劳动制度的到来。事实上,如果仔细比较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就会发现新《劳动合同法》跟《劳动法》相比并无大的出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雇佣劳动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要给劳动者上保险”等要求,在1994年的《劳动法》当中已经全部出现,这次的《劳动合同法》只不过向前稍稍推进了一点点,即原来只提出要求,而没有说明违反要求怎么办,这次在几个条款上稍稍加大了这方面的约束力。

第二,对中小企业需要扶持保护的误读。扶持中小企业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所有国家的国策,但是它本质上与劳工权力的保障是两回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相比于

合同法对中小企业十分不利,应对它们实行豁免。显然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一部法律的实行不可能成为辖制少数人的游戏。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劳工权力的基本保障不能再让位于资本最大利益而大打折扣。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国家应当针对他们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给予融资、人才、税收等政策方面的专门援助,而不能靠牺牲劳工利益维持短期繁荣,这已是经济转型和社会文明发展到这一步都不能支持和容忍的。

第三,对市场价格的误读。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中国的劳工阶层实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所以他们的劳动工资价格并不完全是市场价格,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建立和规范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确定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过程中的市场价格。

第四,关于企业家不应替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误读。就像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态度一样:既然中国已经强大,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有力量和地位了,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某种程度上企业家是和平时期的将军,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坚实中产阶级群体形成,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享有相应地位和话语权的同时,就应该用商业领袖和经济生活领导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责任。

韩国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走过的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朴正熙时代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使得韩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亿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的许诺,然而这些经济成果并未被普通民众分享,而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一如在中国目前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情形,长时期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

当时韩国工人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而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成

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1970年11月13日,在首尔西南部服装工业区,22岁的裁缝全泰壹选择了自焚的极端方式以引起公众关注,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一批劳工活跃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结成地下网络,领导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朴正熙之后的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等历届政府任期都不间断地出现大规模的劳工风潮,罢工此起彼伏,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斗争中逐步强大和成熟。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虽然其间几经周折,也伴随着流血和冲突,但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起伏,韩国的劳资关系总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用工制度,劳工-工会战略,公司文化,摒弃了过去极端的做法。实证就是: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温和的领导人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而非战斗性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领域,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也没能达到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政党由于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不愿与劳工结盟。尤其是,详细的考察表明,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并且把目标指向促进公司民主化、摆脱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等领域。当然,直到今天韩国劳资关系的调整过程仍在继续,但是韩国的历史经验直观地说明,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劳资关系命题的到来是一个必然,它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国家角色和责任的承担,同样伴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同时,韩国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并不漫长。

第五,对人民币升值的误读。

不光是企业家,整个社会如果不把新的劳动合同法放到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考量,显然我们的结论会有失偏颇。不由让人想起当年加入WTO前大家恐惧、困惑、迷茫的情形一样,结果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不仅没有瘫痪,还因为新的生物终端的存在更加完整和健康。劳动合同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企业家需要做的是对这个时代来临的精神准备。

##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 主要面临哪些风险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陆前进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同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雪灾,使得本已上涨的物价水平更难以控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不断贬值进一步加深,外部经济环境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目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外冷内热;通货膨胀压力大;外松内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美联储不断下调利率,美元不断贬值。未来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要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我们应该注意防范以下几类主要风险:

一是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我国贸易部门的影响。目前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从1月份到现在,人民币累计升值约2%,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全年累计升值将超过10%。如果说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加快,那么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就更快。从2005年汇改以来到现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约14%,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实际汇率也相应升值了14%。若考虑国内物价上涨,人民币实际升值进一步增加,因为物价上涨会导致企业出口的成本上升,出口减少,会削减贸易收支的盈余,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民币实际升值已超过20%。另外,国家为了限制“两高一资”和粮食等产品出口,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并开始征收粮食等的出口关税,同时新劳动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些调整必然会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也相当于人民币实际升值了,若考虑到这些,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幅度就更大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以减少贸易盈余,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上,人民币实际升值的速度并不慢,为什么贸易盈余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笔者认为一是由于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期,汇率持续变动的效果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二是企业预期人民币会继续升值,不仅不会减少出口,而且还会不断加速出口,以避免人民币继续升值所带来的出口损失;三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仍然存在。但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必将逐步显现,这些累积效应可能会导致贸易收支发生逆转,甚至会大幅度下降。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是直接的,失业可能会增加。尽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但是应该考虑到经济结构的调整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二是警惕日元升值的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和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连续贸易盈余,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日元面对升值压力上升。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的“纽约广场饭店会议”促使日元升值,纠正美元的过高比价,从而实现各国贸易收支平衡,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日元升值对出口企业的打击是最严重的,1986年日本的经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泡沫形成,一旦泡沫到达顶端,泡沫破灭,经济衰退。虽然我国并没有放松货币政策,但是我国流动性过剩依然存在,资产价格仍有上涨的趋势,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和资产价格的泡沫是重要任务,要吸取日元升值的教训。

三是投机资本内流和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人民币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投机资本觊觎中国,投机资本是以赚取高额利润为前提的,其目的主要是赚取中美利差和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汇兑收益。如果本国资产市场的收益率大于本国的利率,则投机资本投资到资产市场上,它将获得资产市场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投机资本流入将推高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加快,一旦获得收益,将迅速逃离,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大涨后的下跌,如果这些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将推高资产价格,而一旦流出,将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投机资本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一旦风吹草动,它会迅速撤离,对一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创伤。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有相互叠加的效果,二者都是吸引国外资本流入的重要因素,即使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收益不高,人民币加速升值也能给投机者带来很高的收益;同样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上升也会给投机者带来很高的收益。一旦投机资本获利外流,人民币可能会出现贬值的情形,因此投机资本的流入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

四是是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较高。由于基础货币、M1、M2的快速增长,经济体内积聚了大量的流动性,在其推动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2007年下半年分别为105.6、106.5、106.2、106.5、106.9、106.5,2008年1月份更是上升到7.1%,当前的物价已有上涨的趋势。目前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占款迅速上升,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但是流动性过剩依然存在,物价仍然存在上升的推动力。另外,资源价格和服务价格改革的全面推进,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未来价格总水平上升。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给我国带来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对玉米、大豆等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进而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另外2008年1月份和2月份的雪灾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未来通胀的压力还是较大的。

五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美元的不断贬值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缩水,如果投资在美国国债上,美元贬值,其最终收益将大幅度减少。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升值,日本投资在美国国债上的收益下降,出口获得的收入又回到了美国人的口袋。因此我国面临怎样调整国际储备资产结构的问题,以减少美元贬值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进行兼并和收购,同时我国还成立了外汇投资公司,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外汇储备注资中国投资公司,投资海外、兼并和收购。在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下,到海外投资成本降低,是国际发展的一条路径,又可以有效地使用外汇资产。但到海外投资也要防范美元继续贬值的风险,目前讨论比较热烈的是“中国的资本是否正在‘全球抄底’”,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但是能否有效地进行海外投资、兼并和收购依赖于对市场和对宏观金融形势正确的判断。

目前我国经济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将来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适当把握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尽早准备,制定政策,科学调控,防患于未然。

# 人民币离世界第三大货币似近还远

□章玉贵

20年前,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不仅无法与日元相提并论,就连韩元也没有把人民币放在眼里。但20年后的今天,“平易近人”的人民币不仅在大中华区受到追捧,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已经超越日元而被誉为“第二美元”。

从目前的世界货币格局来看,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英镑虽在苦苦支撑,但恐怕来日不多。被欧盟寄予厚望的欧元,尽管近来走势强劲,但其缺乏作为世界主流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即统一的政治环境。除却货币政策态度不一之外,欧元区各国经济战略的不同,也将破坏欧元区政策的统一性。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捣鬼,欧元短期内还很难与美元分庭抗礼。至于受到本国经济拖累的日元近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便是不可一世的美元近来却在象征人类文明的泰姬陵受到史无前例的冷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世界货币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其实,美元的一家独霸本来就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前,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直接或间接地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今天,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三十多年,美国仍在凭借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而维护美国的超强地位。显然,世界人民不愿看到美国倚仗自己的超强地位而在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即便是包括欧盟以及日本在内的美国盟

友都不能容忍美国的颐指气使,纷纷采取各种途径壮大自身实力,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

欧元的诞生正是抗衡美元霸权的一种尝试,日本也曾试图说服亚洲国家建立以日元为核心的亚洲货币体系。

就中国来说,尽管短期内难以挑战美国的经济超强地位,尽管人民币还远远谈不上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中国经济正以快于美国经济的速度发展,尤其是在美日欧经济出现减速甚至衰退的情况下,中国仍有巨大的经济成长空间。到202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与美国平列。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必将取得质的飞跃。

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中外有关专家普遍看好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国内有关专家乐观地认为,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国政府应适时加快推进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甚至有不少专家建议中国大陆以国家货币制度的形式,将人民币改成“中元”,以确立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的法定地位和称谓。在国际上,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夫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只剩下三到四种主要货币,那么人民币将是其中之一。人民币有资格成为与美元、欧元比肩的世界级货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在全球地位的持续上升,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

不过,尽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保持高速、稳定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显著,国际贸易权重不断增大的国家的货币在未来

能的。但人民币要成为世界主流货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化至少需要5到10年准备期。期间,需要克服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瓶颈。

首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市场和监管能力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还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而监管部门也一再强调,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预估人民币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尚需10年左右的时间。

其次,支撑人民币成为世界主流货币的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众所周知,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基础条件是该国必须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元之所以称霸全球几十年,是与美国拥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的;战后初期,美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占世界经济总规模的一半。此后,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使美国在全球经济总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直到今天,美国的经济规模依然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同样,欧元和日元能够成为世界性货币,则该国的经济力量至少应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0%。而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大约只有美国的1/4,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8%,离10%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式

的,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中国不仅无法与美、欧、日相抗衡,即使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二流国家相比亦有不小差距,甚至落后于韩国和印度。所以,尽管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但还远称不上是世界经济强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当然没有太多的国际号召力。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1/2,经济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人民币才有可能真正登上世界舞台,为各国所广泛接受。

再次,落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是制约人民币发挥世界性作用的软肋。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必备条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一败涂地,金融体系漏洞百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香港在那次金融危机中,尽管也受到国际炒家的猛烈攻击,但始终未被击倒,这当中除了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外,本身相对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才是香港傲然挺立的关键;而就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离建成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尚有很大距离。中国银行系统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受到国家的巨资投入,银行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竞争力依然较为薄弱,无论是微观主体的竞争力还是宏观层面的监管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建成全球化的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发达

的独立地位都将难以保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副教授)